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构建我军特色“战役结构”理论体系

■孙景伟

编者按 “战役结构”而非“战役要素”直接决定战役胜负的道理,揭示了战役的以劣胜优原理。力量劣势者可以通过努力,通过形成对己有利的“战役结构”而获胜。而力量优势者,如不能将力量优势转化为对己有利的“战役结构”,也可能导致失败。信息化条件下,面对战略背景、武器装备、作战对象和战场环境的巨大变化,我们要占据战场主动、赢得胜利,需要构建新的具有我军特色的“战役结构”理论体系。

什么是“战役结构”

本文所述“战役结构”,是指战役所包含的一系列兵团战斗及更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数量、样式,以及它们在目的、时间、空间上的联系。任何战役都必然包含一定数量的兵团战斗或更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这些行动在目的、时间和空间上是必然联系的。如辽沈战役包含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和锦州攻坚战等主要行动。在目的上,塔山和黑山阻击战是为了保障攻克锦州;在时间上,两个阻击战必须坚持到锦州攻坚战取得胜利;在空间上,两个阻击战必须将援敌阻击在距离锦州的一定距离上,以阻止援敌干扰我夺取锦州。现代战役也同样包含一系列兵团战斗及更大规模作战行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如制信息权行动能保障制空权行动的成功,没有制信息权就没有制空权;制空权行动能保障制海权行动的成功,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争夺“三权”行动能保障其他行动的成功,没有“三权”做保障,其他行动就难以成功。每一事物都有其特殊结构。一系列兵团及更大规模作战行动及其之间的关系就是战役所特有的结构。

以有利于己的“战役结构”对付敌人,是赢得胜利的奥秘所在

“战役结构”决定了战役胜负,并牵

引和规范着战役指挥、战役协同、战役保障等诸多事物。要想赢得战役胜利,应该至少做好两件事:一是选择一系列对己有利的战斗、突击、机动等行动作为构成战役的“基本粒子”;二是正确设计一系列作战行动在目的、时间、空间上的关系,使它们能够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任何一个时期,一支军队面临的作战行动性质都是多样的,一系列作战行动之间关系也是多样的。选择对己有利的“战役结构”,是实施战争、战役指导的关键。

比如,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存在着多种性质的战斗、突击、机动:“城市暴动”性质的作战等,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城市攻坚性质的作战等,如打长沙、攻赣州等;阵地防御性质的作战等,如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广昌保卫战等;游击战、运动战性质的作战等,如中央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的诸多战斗。选择何种“战役结构”成为我红军时期“打胜仗”的关键。依据井冈山时期我军人员少、装备差、缺少必要的火力毁伤能力,以及在阵地攻防、城市攻防等战斗中不占优势的客观现实,毛泽东开创性地将一系列小规模袭扰、偷袭、奔袭等战斗样式进行组合,攻敌于不备之时,赢得了井冈山时期一系列反“进剿”、反“会剿”的胜利。闽西时期,针对我军已经发展到数万、有了游击战经验,根据地得到相当规模扩大等现状,创造性地将一系列正规兵团的伏击、遭遇、奔袭等运动战战斗组合成战役,赢得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对此作了系统的理论总结,提出了“作战形

式”概念。此概念最核心的内涵是选择“战役结构”的性质。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抗日战争中,我军选择了游击战“战役结构”;解放战争中,我军选择的是运动战“战役结构”;抗美援朝战争前期我军创造了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战役结构”,后期又创造出以坑道为依托的坚固阵地防御“战役结构”。这些“战役结构”,都是依据当时客观实际,从发挥我军优势、削弱敌人优势出发,将有利于我的一系列战斗、突击、机动等行动组合成战役。我军在几十年战争实践中之所以能以劣胜优,战胜各种强敌,在作战指导上最核心的要诀,就是选择对己有利的“战役结构”。

信息化条件下,我军作战的战略背景、武器装备、作战对象、战场环境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体化联合作战背景下的许多新的战斗、突击、机动样式。在纷繁复杂的新作战行动样式中,我们需要理清两个问题:一是新形势下哪些作战行动对我有利;二是如何选择对我有利的作战行动组合成战役,使一系列作战行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构建我军特色“战役结构”理论体系,有助于提升能打打仗、打胜仗能力

什么是能打打仗、打胜仗能力?从“战役胜负是由‘战役结构’直接决定的”这一结论出发,能打仗、打胜仗能力表现在三个环节上:一是在战役筹划阶段,指挥员要具备依据敌情、战场环境、我情等实际情况,筹划对己有利“战役结构”的能力;二是在对抗过程中,指挥员要有运用隐真示假等各种造势手段,造成并利用敌人失误,形成对己有利“战役结构”的能力;三是在战役打响后,部队要有打赢已经形成的一系列作战行动的能力。

上述三种能力,需要通过构建我军特色“战役结构”理论体系来获得。首先,要论证信息化条件下我军必须且能够进行哪些性质的战斗、突击、机

动等行动,这些行动需要什么力量、采取什么行动程序、能够达成什么作战目的等,构建起具有我军特色的战术理论体系。有此理论,就能找出我军在战斗层面存在的不足,对能否打赢各种作战行动做到心中有数。其次,要研究一系列战斗、突击、机动等行动的组合方法。即哪些应该先进行,哪些应该后进行,论证一系列作战行动在目的、时间、空间上的配合关系,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战役结构”理论体系。有此理论,就能对我军在战役层面存在的不足,对如何使用战役力量、如何摆兵布阵、如何定下高质量战役决心做到心中有数。再次,要研究战役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在筹划“战役结构”、形成“战役结构”过程中的工作程序、内容和方法,即确定在筹划和实施过程中,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在什么时机、按照什么标准、运用什么方法、完成什么工作。有此理论,战役筹划和指挥能力的培养就有了依据。

构建上述理论体系,于战役指挥员和指挥机关而言可以培养筹划打仗的能力,于部队而言可以训练在实战中打赢一系列作战行动的能力。

总而言之,历史上任何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都必须以具有自己特色的作战理论为支撑。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屡克强敌,就是有“游击战”“运动战”等特色理论指引。今天,也只有构建起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理论,才能把能打仗、打胜仗要求落到实处。这一理论必须回答好以下问题:一是回答好我军将来的战役包含什么样的战斗、突击、机动等行动。要以兵器试验、战斗实验数据为依据,对这些作战行动所需力量、作战空间和持续时间、可能的行动程序、双方可能的损耗、可能的结局等做出定量和定性分析,建立起技术和战术数据库。二是回答好在各种战役样式中,上述一系列作战行动应以何种目的、空间和时间关系进行组合,构成战役整体。三是回答好战役指挥员和指挥机关筹划战役过程中的逻辑方法,及以此逻辑方法为基础的工作程序、内容和标准。四是回答好在对敌条件下,运用什么手段才能形成己方所需要的“战役结构”。

群策集

行军打仗,自然离不开指挥决策。所谓决策,就是对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法的运筹和确定,其基本步骤及要求可概括为“先策后决”“多策慎决”。谋议可谏于众人,决断须归于一将。实践证明,作为战场最高指挥官,要想在“群策”之中达成英明决断,首先须有辨策之明、识策之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在拟制诺曼底登陆计划时,参谋长史密斯建议派两个空降师至瑟堡半岛,作为在法国登陆的预先行动,以掩护盟军在抢滩登陆时可能遭到的德军反扑。而盟军空中顾问、英国空军司令马洛里则激烈反对这一空降行动,认为德军必定在瑟堡构筑强大的防空工事,这将导致两支精锐部队毫无价值的牺牲。面对两种意见相左的争论,艾森豪威尔明白,假若空中顾问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些惨败的影响会蔓延到全军。如果不派兵到瑟堡建立前进基地,那么势必给登陆作战带来更大伤亡,甚至还有战败的危险。经过权衡和激烈的思想斗争,艾森豪威尔采纳了参谋长的意见,实践证明收到了出奇之效。与之相反,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以军高层在如何防范埃及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人主张以坚固阵地防御为主,有人主张以灵活机动防御为主。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达达福在这两种意见之间举棋不定,结果把作战指导搞得含糊不清,致使战争爆发后以军陷入极大被动。

国外管理学家认为,如果智囊机构的专家意见有三分之一被决策者采纳,就是一个有用的智囊团;如果有一半以上意见被采纳,算是高明的智囊团;如果百分之百被采纳,那么不是智囊们越位,就是决策者无能。应当看到,智囊团成员由于阅历不同、专业不同,认识问题的方法也有差异,对风险、代价、效益权衡的度量也不尽一致,所提出的建议往往相差甚大,有的甚至完全相悖。一个高明的决策者往往能够高屋建瓴,善于宏观思考,对智囊们的建议综合比较,创造性地进行优化决策。而水平不高的指挥员则会在众多建议面前裹足一、无所适从,最终造成决策失误。很显然,提升指挥员辨策识策本领已成为决策中应该解决的首要环节。

指挥员慧眼识策,既需要求同,更需要求异。正所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战场上大多数人能想到的诀窍,敌人肯定也能想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决策建议的高下优劣,一定不是它们的相同点,而是它们的不同点,正确的意见、最优的方案也很可能就产生于这些与众不同的观点里。所以,许多高明的指挥员在组织决策时,可以说既想听一致的声音,更想听不同的声音;既不会被多数人的意见所左右,更不会将少数人的意见忽略掉,并敢于果断采纳少数人的意见,定下决心。

指挥员慧眼识策,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胆识。有人说,“决策是一场孤独的冒险。”这是因为,决策建议是对未来的设想与谋划,而未来又是千变万化

提升指挥员辨策识策本领

张西成 这就意味着各种备选方案建议,即便经过计算机的模拟检验,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十全十美,长中肯定有短、利中必然有弊。关键看指挥员如何权衡、怎样取舍。战争作为一种活力对抗,常常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如果一心想避开风险,就等于放弃了抓住机会的可能;常常是最大的不可能中蕴藏着最大的可能性,如果总是囿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战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奇迹出现。

指挥员慧眼识策,既需要专才,更需要通才。指挥打仗,与多方面的知识息息相关。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门家,但他应该有统揽各专业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复合型认知才能。正像一个大乐队的指挥,必须懂得各种乐器的构造和演奏方法,否则就难以与智囊们在同一帷幄之中运筹谋划、辨识高见。指挥员千万千万不能不懂装懂、刚愎自用,一见众人的论见与自己的经验决策不符,就斥为“怪论”并束之高阁;更不能把本该自己“决”的事交由智囊们去干,甘当“甩手掌柜”。如若这样,指挥员将更多承受错误决策的风险,甚至吞下作战失败的苦果。

如何提高打击时敏目标能力

■张 肇 张乃敏 朱建平

攻击坚固工事,也是打击时敏目标的利器,甚至具备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潜力。当前,世界军事强国都在加快包括高超声速武器在内的新技术新概念新机理武器的实战化进程,积极推动反临近空间飞行器、反隐身飞机等新质作战力量建设,发展先进的高超声速导弹、高能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察打一体的无人机等武器装备,构建形成陆海空天基融合、近中远程衔接、有人无人搭配、多机理毁伤组合的规模化新质作战力量打击体系,为打击时敏目标提供足够的力量选择。

全面提升部队戒备状态。打击稍纵即逝的时敏目标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做到有备无患。传统战争由于技术落后,作战行动易受力量状态和战场环境的影响。比如,游牧民族远征一般会避开战马瘦弱的春季,装甲部队奔袭通常要避开道路泥泞的雨季。信息化战争,网络支撑、信息共享、分布指挥、要素联动的新质能力,使得作战行动受时间制约的影响越来越小,作战时间向全时拓展。因此,应树立全时作战观等现代战争时空观。将大量准备工作提前到战前,以平时的充分准备换取战时的宝贵时间。通过优化配置、精简流程、饱和前置等手段提升戒备状态,情报、通信、定位导航等各类保障要素跟进待命,创造初始时间优势窗口。打破按照时间一维性流动的传统程式化作战流程,利用时间的同步性特点,统筹作战目的与行动方法的关联,尽可能围绕作战目标同步展开多重作战行动,达到短时高效的作战目的,赢得持续时间优势窗口。

巧妙降低目标时敏性。任何时敏

目标都不可能时刻处于运动之中或工作状态,弹药告罄需补弹,油料耗尽需加油,电力不足需充电,达到工作周期需维护保养,这些都是其失去时敏性的窗口。抓住此类时机可以事半功倍取得重大战果。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需要打击和可以打击的目标越来越多,由实体目标向虚拟目标拓展,由静态目标向动态目标拓展,由粗略目标向精确目标拓展,目标分析选择的复杂度和难度也随之加大。未来战争,在做好目标情报搜集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加强情报研判,完善目标分析机制,发展目标分析手段。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传统方法基础上,引入系统科学和复杂网络理论及工具,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加强对多源目标信息的融合处理和目标数据的长期积累,不断完善目标数据库,提高数据的保鲜度,推动目标分析由预先分析向实时分析转变。构建可靠的作战仿真系统,用高超的谋略和科学的计算降低目标的时敏性,把“发现目标抓紧打”变为“猝然发难抢先打”“预判位置等着打”“诱敌入瓮设伏打”。

科学压缩侦察打击时延。打击时敏目标,堵点卡点往往出现在情报保障周期长、信息流转链路长等环节。鉴于此,应注重优化完善专项目标情报保障机制、扩充情报保障容量、构建情报直保链路。另外,对时敏目标打击行动,可由上级明确启动打击条件,下放指挥权限,以求抓住战机、快速响应,实施高效火力打击。尤其是深入一线、抵近目标或突遇重要敌情的作战力量,应该被授予依据规则

自主交战的权限。可充分依托战场公共信息环境,直接协调控制相关作战集群、单元、有人/无人作战平台发起打击行动或提供支援配合。组织此类行动的基本流程是,发现敌情的作战力量依据临机行动规则发送“支援请求指令”,收到其他作战力量回复的“支援响应指令”后,控制它们协调一致地展开行动。临机行动规则是自主交战的基础,它明确了自主交战的具体条件、敌情等级及对应的支援力量、响应支援的行动要求、时敏目标清单、多方支援需求冲突时的优先排序,等等。

加速构建全域杀伤网。单一杀伤链容易被对手“击节断链”,毁伤效果不托底。将不同军兵种、不同领域的侦察平台进行网络化链接,构建广域探测预警、区域追踪监视、近距离识别定位的一体化侦察感知网络,并与多级联动的指控系统和全域泛在的武器平台紧密交链,打造跨域杀伤链,能提高链路鲁棒性,形成多域作战优势,确保杀伤效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跨域杀伤链加速向全域杀伤网演进,呈现出迭代升级、全域泛在、异质多源、自主分布、动态重组、快速闭合、多能运用等特征。应加快推进传感器网、指控网、武器网三网有机融合,通过持续的量变积累促进跨域杀伤链实现向全域杀伤网的质变跃升。确保在未来更快节奏、更高强度对抗的信息化智能化战场上,能根据战场态势、作战任务、打击目标,临机从全域空间选取最优和较优的多个功能节点,动态构建一条最优杀伤链和多条备选杀伤链,实现对各类时敏目标的即时打击。

观点争鸣

随着新技术新手段的不断出现和应用,战争的科技含量与复杂程度正在明显上升,特别是作战空间的虚拟性、作战形态的“科幻性”,很可能颠覆人们对作战模式的传统认知。认真研究可能出现的作战新模式,有助于认清未来战争走势,掌握战场对抗主动权。

“囚笼”模式。目的是将对手打击火器威胁范围限制在极小领域,对其战略威慑武器造成“升空”即秒杀,形成“逆震慑”。其典型作战场景和流程可能是:首先以太空侦察卫星形成侦察网络,经过特征匹配和行动推演,预判对手火器动向和发射先兆。然后以天基武器为主,通过定向能或微波、激光等不同打击方式,在空域上形成首发区域内部摧毁,在时域上形成分秒级摧毁的综合杀伤效果。对手的所有打击武器效能均可能受限制在战术层面,落弹区变成自己国土范围内,仿佛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笼子里,彻底失去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

“凝固”模式。表现在通过改变空气介质密度、性质构成,对一定范围内的兵力或武器装备的行动能力造成限制,使之难以形成有效的攻击行为。其典型作战场景和流程可能是:首先,快速对战役战术区域范围内进行气象探测,并分析湿度、含氮量及其他特殊元素含量。然后,依据风向快速播撒含能材料粉尘或特殊化学物质,以纳米级颗粒与

脑洞大开的作战新模式

■刘建民 许景成

空气中的气溶胶结合在一起,针对金属、布料、皮肤等不同材质发生不同次生反应,瞬时造成极大阻力。对运动中的人员装备就像视频按下了“暂停”键,或是电影的超慢动作回放,极大地降低对方战斗效率。

“灰域”模式。“灰域”模式的典型作战场景和流程可能是:首先,通过天基系统对战场对手的生理和行为特征进行收集,形成面部表情、虹膜纹理、身体气味、行为习惯综合一体的“基因库”。然后将“基因库”与具有攻击性的蚊虫、蚁类等有毒生物进行泛在匹配,从而指示攻击方向和潜在目标。那么,进入“基因库”的战斗人员将在不被限制的地域内被有毒生物追踪和攻击。这种介于细菌战、病毒战边缘的攻击模式,似乎又处于生物战的灰色地域,对受攻击方将会造成极大困扰。

“致盲”模式。在开战之初就使对手丧失探测、预警、侦察、通联的能力,把对手打回冷兵器时代,使其作战样式和实现能力彻底降维。其典型作战场景和流程可能是:首先,综合运用全球探测系统,侦察定位并跟踪对手具有电磁频谱特征的装备、系统和信号。然后,通过察打一体无人机、巡飞弹、电磁脉冲弹、反辐射寻的弹等,分区域、分类别、无差别打击作战区域内对方所有具有电磁信号的目标,使其降效失能。这种在极短时间内利用信息系统的脆弱性,使对手造成失明失聪的“致盲”手段,将给对手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和行动失序,甚至丧失作战的勇气,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